

梁啟超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二九）字卓如，號任公，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學者。他學識淵博，涉獵廣泛，曾潛心研究佛學。一九二二年，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創辦「支那內學院」，創講「唯識抉擇談」，學人畢集，如熊十力、梁漱溟、湯用彤、陳銘樞、王恩洋、呂澂等均得列門牆。當時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授課，也隨喜前往聽講，因病中輟，曾給歐陽竟無一信說：

「自悵緣淺，不克久侍，然兩旬所受之熏，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。」此後，他寫了許多有關佛學的論文，見地卓正，深入淺出，頗受當時學林的重視。

梁啟超在一八九五年與康有為等組織「政學會」，主張變法，由「公事上書」得到光緒皇帝的接受。一八九八年，歲次戊戌，光緒下詔變法，但僅「百日維新」就由於慈禧太后的反對，歸於失敗。譚嗣同等被處決，他和康有為出逃國外。在日本流亡時期，他研習佛學頗勤，曾賦詩以明志，詩云：

「十年以後當思我，
舉世若狂欲語誰？
世界無窮願無盡，
海天遼闊立多時。」

這正是華嚴行願的發揮。他自退出政治舞台後，在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任教，曾試圖以心理學原著闡釋佛教的「五蘊皆空」之義。由於早年受康有為的「大同書」與譚嗣同的「仁學」的影響，他的佛學觀點，偏重於華嚴的菩薩行與誓不成佛之旨，後來於華嚴、法相兩宗契合，並脫穎而出。

在「論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大」一文中，梁啟超寫道：

「第一，自唐以後，印度無佛學，其傳皆在中國。……自玄奘西遊，遍禮戒賢諸論師受法而歸，於是千餘年之心傳，盡歸於中國。」

其二，諸國所傳皆小乘，惟中國獨傳大乘。……當馬鳴初興

時，而印度本教諸人中，固已紛紛集矢，謂大乘非佛說，故其派衍於外國者，無不貪樂偏義，謗毀圓乘。中國人之獨受大乘，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較高於彼等之明證也。

第三，中國諸宗派，多由中國自創，非襲印度之唾餘者。……故依華嚴以立教，實自杜順、賢首、清涼、圭峯之徒始也。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。又如禪宗，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，但密之又密，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，無能知其淵源，其真偽固不易辨。……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。然則佛教有六祖始有禪宗，其猶耶教有路德始有布羅的士丹也。若夫天台三昧，止觀法門，特創於智者大師，前無所考，旁無所受，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。

梁啟超的佛學觀點

蔡惠明

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。」

這四個特色，恰如其份地概括了中國佛學的特點，是客觀而中肯的。梁啟超還試圖從佛教中尋求改造社會的途徑，他在「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」這篇論文中，高度評價佛教之信仰，認為有益於羣治。他精闢地提出這樣六個觀點：（一）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。（二）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。（三）佛教之信仰乃乃入世而非厭世。（四）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。（五）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。（六）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。並作出結論說：

「佛學廣矣大矣，深矣微矣，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？以佛耳聽之，不知以此為讚佛語耶？抑謗佛語耶？雖然即曰謗佛，

第四，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。……佛教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大方面，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。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。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。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，故所受者，多在其哲學之方面，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。而佛教之哲學，又

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，吾願造是因，且爲此南瞻部洲，有情衆生，造是因。佛力無盡，我願亦無盡。」

又一次體現了他的華嚴行願的發揮。

在「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」這一長篇著作中，梁啓超深刻地分析了佛出世時印度思想界混亂的形勢，引「梵動經」所說將當時印度外道歸納爲六十二見，八大類。就是：（一）常見論。主張世界及自我皆常存。（二）半常半無常論。主張一切現象都一部份常存一部份變滅。（三）有邊無邊論。專討論世界有限無限之問題。（四）詭辯論。即不死矯亂論，對於一切問題都不下決定的解答，專爲不可捉摸之說，故亦號捕鰻論。以上四類皆就現世立論，故謂之「本劫本見」。分屬此四類者凡十八家。（五）無因論。主張一切現象皆偶然發生，無因果關係。（六）死後有想無想論。專討論死後意識是否存在及作何狀態等種種問題。（七）斷見論。主張死後滅斷。（八）現法涅槃論。主張現在爲最高理想境界。以上四類，皆就未來立論，故謂之「末劫末見」，分屬此四類者凡四十四家。在如此混亂複雜的思想形勢之中，佛教異軍突起，獨樹一幟，鶴立雞羣，使六十二見黯然失色。他寫道：

「一般多以爲佛教爲談玄家。其實不然。釋迦是一位最注重實踐的人。……釋迦說法並不是談空說，有鬧着玩。他是一位忠實的臨床醫生，專講對症下藥。凡一切理論『非梵行本，不趣智、不趣涅槃者，一向不說』（『箭喻經』）。……釋迦唯一的目的在替衆生治病，但決不是靠聖水來治，決不是靠湯頭歌訣來治。而是以實際醫學爲基礎。經過嚴密的考察、分析與批評，然後確定治病方針。不惟如此，他要把這種學識傳給病人，令他們會病前預防，病中對治，病後療養。把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培養發展用來剷除自己的病根。就這一點而論，釋迦很有些像康德，一面提倡實踐哲學，一面提倡批評哲學，所以也可以名佛教爲『哲學的宗教』。」

梁啓超還認爲：「佛教的宇宙觀，完全以人生問題爲中心。……佛教哲學的出發點，非哲學的而是科學的，非演繹的而是歸

納的。」

接着，他敘述了原始佛教教理綱要，從如實知見（諸法實相）、因緣觀、十二因緣，業與輪迴，直談到三法印以及解脫、涅槃，不僅發揮恰恰到好處，而且如數家珍。最後他還揭示了佛教的修養方法：（一）智慧的修養。佛教是理智的宗教，在科學上有它的立場，但却不能認爲它是主知主義派哲學。佛所謂智者，謂對於一切「世間」能爲正當之價值判斷，根據這種判斷更進求向上的理想。（二）意志的修養。有消極積極兩方面：消極方面主要破除我執、制意志。積極方面是以欲制欲（雜阿含三十五），以勇猛、精進、不退轉磨練、和激勵意志。（三）感情的修養。萬法以慈悲爲本。慈謂與人同喜，悲謂與人同憂。佛以破除假我故，實現物我同體的境界。所有苦樂，悉同身受。

梁啓超在此文的最後提到「涅槃的境界」，他說：

「涅槃到底是什麼境界呢？佛每說到涅槃，總說是現法中自證自知自實現。我們既未自證自現，當然一個字也說不上來。依訓詁家所解釋，大概是絕對清涼無熱惱，絕對安定無破壞。絕對平等無差別，絕對自由無繫縛的一種境界。實相畢竟如何？我不敢插嘴了。但我們所能知道：安住涅槃，不一定要拋離塵俗。佛在菩提樹下已經得着涅槃，然而還說四十九年的法，不厭不倦，這便是涅槃與世法不相妨的絕大憑據。」

從以上所引資料可以看到，梁啓超從華嚴性海，法相識浪的大乘教義中，闡發了「發菩提心」、「行菩薩行」的義理，在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上曾下過一番探索研討的功夫。他對佛學研究是實事求是的，觀點也是中肯與客觀的。這與章太炎那種反覆無常有着根本的不同。但他畢竟僅是個佛學的研究者，是學佛的同路人，沒有依教奉行與修持實踐，因此也不可能深透法益，實現他嚮往的華嚴行願。當然更未能深入經藏，修定發慧，親證涅槃的最高境界。這是名士學佛的通病，是值得引以爲訓，警惕改正的。